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 北京儿歌

一意二威达雷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  
分卷主编 翟贇 郭利霞 陈颖

#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

## 北京儿歌



「意」威达雷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 北京儿歌 / (意) 威达雷编著. —影印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8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8587-9

I. ①汉… II. ①威… III. ①汉语—口语—对外汉语教学—教材 IV. ①H1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5701号

- 书 名**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北京儿歌(影印本)  
HANYU KOUYU CHUJI DUBEN · BEIJING ERGE (YINGYINBEN)
- 著作责任者** [意] 威达雷 编著
- 责任编辑** 王禾雨 宋立文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87-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pup@pup.cn](mailto: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 印 刷 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4.25印张 177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93.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  
(14BZJ022,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总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她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

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大力支

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鱒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述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主编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述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簪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崑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

化、亦我、梅菟、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

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导读

李海英

近30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海外的汉语教学研究持续升温，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国内，晚清以来西方外交官所编写的汉语读本，连同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教材，已成为汉语学界和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民国以前的西方汉语教学大致由传教士、外交官、来华商人等几类人主导。不容否认，西方来华外交官代表西方国家的强权利益，但在文化交流方面他们也并非全无是处。比如，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曾就1896年之前流行于中国北方的官话童谣进行过认真的整理，编译而成汉语读本《北京儿歌》（*Pekinese Rhymes*, 1896）；1901年出版了由99篇中国传统寓言笑话改编而成的《汉语口语初级读本》（*A First Reading Book for Students of Colloquial Chinese*, 1901），两本书都保留了北京方言的诸多特点。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两本书不仅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以后的中国民俗研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晚清北京语言和社会风貌的珍贵文献资料。

## 一、关于作者威达雷

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Guido Amedeo Vitale, 1872—1918，亦译卫太尔、韦大列），曾于1893—1899年（清光绪年间）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翻译（1896—1897年间兼代办），1899—1915任汉文正使。威达雷的老师是意大利教授诺全提尼（Lodovico Nocentini, 1849—1910），诺全提尼曾于1883年

被派驻上海领事馆，是第一位以“实习口译员”身份在中国生活过的意大利教授，五年后回国继续担任罗马大学中文教授。《北京儿歌》第一版的扉页上，威达雷就表达了对老师诺全提尼的敬重和友情。威达雷语言才能卓越，中文发音几近完美，深受当时意大利驻华大使的赏识，据说连慈禧太后也非常欣赏他（图莉安 2007）。威达雷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汉语读本的研究和整理上，其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北京儿歌》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等。中国人对这两部作品赞誉有加，比如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改革运动，就从中汲取了灵感。另外，威达雷与人合写的《蒙古语语法及字典》（*Grammaire et vocabulaire de la langue mongole, dialecte des Khalkhas*）也是其学术水准的极好证明，该书于1897年在北京出版。1899年3月，威达雷获法国政府授勋“银棕榈”，并被命为“学院骑士”（图莉安 2007）。

本书所选的威达雷的两部汉语著作，各有其特点。如果说童谣集《北京儿歌》是威达雷所收集的中国民间故事的零散碎片，是其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采风之作的话，《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则是他精心甄选编译，为来华西方人学习汉语官话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口语读本。因本丛书重点是汉语教材，故将早出版的《北京儿歌》排在《汉语口语初级读本》之后。

## 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成书背景及体例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又译为《北京笑话》，1901年由北堂印书社出版。作者在初版序中提到，该书的99篇笑话毫无疑问属于民间故事，但是在中国，每一位读书人对于汉语口语有一种天然的厌恶，以致他选编的那些广为人知且被广泛引用的篇目只是以书面语的方式存在。因此，威达雷从几千篇作品中挑选出这些笑话来并将其译成官话，他希望那些学习汉语口语的人能够从这些日常课文阅读中受益，能从中感受到欢乐，从而减轻他们学习汉

语时的痛苦和沉闷。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由索引和正文两个部分构成。索引包括99篇中国传统笑话的英文译名和各篇目的页码，按先后顺序横排印刷，借鉴了当时教会编写汉语教材的编排方式。正文则完全为用官话写成的99个笑话。每一篇笑话标题前有序号，另行接下来是笑话全文。正文自右向左竖行编排，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编排方式，文中只有句读，没有采用新式的标点符号。

### 三、《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特色与价值

#### （一）用浅近的北京话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寓言笑话

我们知道，笑话是小说的一种，属于街头巷尾的杂谈。威达雷通过《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寓言笑话。这些经作者改编自明清书面语的小故事，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展示了中国式的幽默。

据笔者统计，威达雷从《笑林广记》等明清以来的几部笑话集中搜集语料，并将其转化成北京话。如《笑林广记·古艳部·启奏》的原文为：

一官被妻踏破纱帽。怒奏曰：“臣启陛下，臣妻罗唆，昨日相争，踏破臣的纱帽。”上传旨云：“卿须忍耐，皇后有些惫赖，与朕一言不合，平天冠打得粉碎。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游戏主人、程世爵）

此文被收入《汉语口语初级读本》时，题目未做改变，但表述的文字换作了20世纪初的北京话：

有一位老爷被太太踹碎了他的纱帽。心里很有气。就进官奏事。说。臣启陛下。臣妻凶横。因为彼此拌嘴。将臣的纱帽打破。求皇上把他治罪。皇上就口传旨意。说。卿家。总得要忍耐些儿才是。你不知道正官皇后。也有点儿惫赖。昨几个与朕一言不合。将朕的平天冠。扯得粉碎。我朕还不敢生气哪。你那一顶纱帽。又算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第6页）

从行文来看，不仅去掉了原文中的粗鄙用词，而且大大增加儿化等北京话特色。其实，威达雷除了从清游戏主人编《笑林广记》中选用素材外，也从明浮白斋主人《雅谑》、明冯梦龙《广笑府》、明赵南星《笑赞》、清石成金《笑得好》等其他几部明清笑话集中搜集了一些思想健康、文笔纯熟的篇目，只是他将文言改编成了当时的北京话。如《广笑府·一钱莫救》原文为：

一人性极鄙吝，道遇溪水新涨，吝出渡钱，乃拼命涉水。至中流，水急冲倒，漂流半里许。其子在岸旁觅舟救之。舟子索钱，一钱方往。子只出五分，断价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际，回头顾其子大呼曰：“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冯梦龙）

该篇收到了《汉语口语初级读本》中，不仅题目改作“溺水”，内容也做了改动：

有一个人。掉在水里了。他儿子大声嚷着说。快来救人哪。救上来。我必重重儿的谢候他。他父亲在水里。也探出头来。高声的喊叫。说要是三分银子。便来救我。若是要的多。教他们不必来救。（第113页）

可以说，改编后的文本，简洁易懂，口语色彩明显。《汉语口语初级读本》中的个别篇目如“训子”，《广笑府》和《笑林广记》中均有收录，只是威达雷改编后的行文与两书不同，更加平易朴实，口语化的特色极为明显。

## （二）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北京话语料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所收录的99篇笑话故事，采用了比较典型的北京官话来进行记录。

在语音方面，大量使用儿化韵，这是典型的北京话特征。然而其中也有个别故事记录了其他地区的方言读音。如第55个笑话“陕西诗”中，“绿念溜”“疙念嘎”“革落念嘎拉”“红念浑”就记录了当时陕西方言的读音。

词汇方面，《汉语口语初级读本》使用了不少北京话词汇，如“长

虫”“煮饽饽”“未了儿”（书中还收了“未未了、未后儿、到了儿”等同义词）、“起”（如“正在说话的工夫儿，就见太太起后堂猛然出来”）、“唠”“讨愧”“伙”“齁咸”等词。其中保留了部分文言词，如“堪堪”（渐渐、慢慢）。除此之外，书中还使用了一些同素逆序词。有的词形不同，意思差别较大，如“兄弟/弟兄”，前者是指弟弟，后者是指兄长和弟弟二人；还有一些同素逆序词如“共总、耍戏、较比、嚏喷”等则与现代汉语中的通用形式（总共、戏耍、比较、喷嚏）意义相同或者相近。

语法方面，副词“狠”和“很”、语气词“了”和“咯”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但均有较高的出现频率。至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尚需进一步研究。

### （三）符合汉语口语读本的基本要求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句式简短，表意明确，生僻词语少，十分符合威达雷将其用作官话口语读本的要求。另外，其中的幽默风趣的语言，含蓄蕴藉的韵味，从输入的角度来说，有利于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兴趣。只不过其中内容与当时来华西方人的生活略有距离，对于学习者来说又有一定的影响。

威达雷在《汉语口语初级读本》中选用且改编了明清时期流行的寓言笑话，一方面为我们保留了当时北京话的语言面貌，另一方面有利于当时的西方人学习北京话，同时也向西方人推介了中国的文学样式，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